

为何爆发内战：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比较^{*}

曾向红 陈一一◎

【内容提要】 1992—1997 年，塔吉克斯坦爆发了一场伤亡惨重的内战。与其内外环境相似的吉尔吉斯斯坦虽然于 2005 年与 2010 年分别发生“郁金香革命”与“4·7”事件，却避免了内战的发生。为什么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内战而吉尔吉斯斯坦没有？本文认为，在存在可能导致国家出现内战的地区权力不平衡等结构性因素条件下，是否会爆发内战，取决于敌对双方是否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和能力。如果敌对双方同时具有内战的意愿和能力，内战的爆发不可避免。塔吉克斯坦内战属于这一情况。如果敌对方只有内战的能力而缺乏内战的意愿，或者只有内战的意愿而缺乏内战的能力，那么内战就不会爆发。“郁金香革命”属于前一种情况，而“4·7”事件属于后一种情况。如果冲突方既无内战的意愿又无内战的能力，即使出现政治动乱，也无内战之虞。

【关键词】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前景理论 内战意愿
内战能力

^{*} 本文研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欧盟中亚战略的实施及其对中国中亚战略的影响研究”的资助。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杨恕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文中的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2/4（总第32期），第91—12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自独立以来，中亚五国在实现政局稳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土库曼斯坦在尼亚佐夫突然去世的情况下避免了政局的急剧动荡。至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下称分别简称为“塔吉克”或“塔”与“吉尔吉斯”或“吉”）这两个小国则经历了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政局稳定受到严重冲击。1992—1997年间，塔吉克经历了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唯一一次内战。而吉尔吉斯首先在1990年6月初的奥什州发生了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族群冲突；随后在2005年3月发生了反对阿卡耶夫政府的“郁金香革命”，建立了巴基耶夫政府；在2010年4月7日发生反对政府统治的“4·7”事件，颠覆了巴基耶夫政权。^①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塔吉克爆发了内战而其他中亚国家没有，即使发生过两次动荡的吉尔吉斯也没有出现内战？本文旨在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替代性解释进行评价；然后提出本文的关于内战是否会爆发的分析框架；再对塔吉克与吉尔吉斯的冲突案例进行检验；最后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现有解释及不足

作为一种比较研究，我们需要找出导致塔吉克发生内战而其他中亚国家没有出现内战的原因。本文选择吉尔吉斯而非其他中亚国家作为与塔吉克进行比较的案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同，吉尔吉斯自独立后虽然没有出现内战，但曾经发生两次政治动荡。对本文而言，能否解释吉尔吉斯为什么没有发生内战，构成一个“硬案例”，一旦解释成功有助于增强结论的可信性。第二，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更具可比性。就综合国力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Pogroms In Kyrgyzstan,” *Asia Report*, No. 193, August 23, 2010, pp. 8–10.

与基本国情而言，塔、吉两国较为相似。经济上，塔吉克与吉尔吉斯排在中亚五国的最后两位。2010年，塔、吉GDP分别为56.13亿美元与45亿美元。^①宗教上，两国人民都主要信奉伊斯兰教。此外，塔吉克与吉尔吉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相似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如：社会稳定状况欠佳，经济发展滞后，现代化水平较低，宗教问题复杂，地区发展差距明显。但与塔吉克不同，吉尔吉斯还面临内部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间的紧张关系。在基本条件与挑战相似的情况下，将塔、吉两国而不是大国与小国进行比较，有助于探究导致塔吉克发生内战而吉尔吉斯即使到了内战边缘却避免了内战的关键因素和机理。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有两种观点认为可以解释塔吉克发生了内战而其他中亚国家没有发生这一问题。一种观点通过对独立初期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政局的比较，认为两国内部敌对双方基于对自身和敌方势力的错误估计，导致塔吉克发生了内战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对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政治发展的影响力和政策立场，是导致塔吉克发生内战而吉尔吉斯即使发生骚乱也未演变为内战的关键原因。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不能对这一问题提供充分解释。

（一）基于塔吉克自身特点的解释以及基于比较研究的认知解释

以往研究塔吉克为什么会发生内战时，研究者们往往缺乏比较维度，导致据此提出的观点难以解释为什么其他中亚国家没有发生内战。

对塔吉克内战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首先是历史解释途径，认为塔内部四个主要州——列宁纳巴德州（现索格特州），库尔干秋别州、库里亚布州（这两个州后合并成哈特隆州）与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高度不满。历史上存在的上述积怨，在苏联解体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Data of the World Bank），<http://search.worldbank.org/data?qterm=tajikistan&language=EN>，<http://search.worldbank.org/data?qterm=kyrgyzstan&language=EN&format=>。

前后引发塔吉克内战。^① 其次是地区主义解释途径,这种解释认为,独立后塔地方州市势力迅速膨胀而中央政府权威下降,列宁纳巴德州在中央政权中垄断地位的继续,引发塔内部那些希望独立后分享更多中央权力的州市的不满,从而使本已矛盾重重的中央地方关系面临破裂危险。1992年5月反对派的游行是导火索,它使塔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内战由此爆发。^② 最后是以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斗争为中心的解釋途徑。这种观点认为,中亚国家的广大穆斯林对苏联长期实施的禁教政策强烈不满,解禁后,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开始组建伊斯兰政治组织,试图改变苏联时期遗留的政治体制,这对中亚国家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塔吉克内战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激化和结果。^③

以上几种解释路径指出了塔吉克内战出现的政治、宗教、族群等复杂背景,然而它们并不能构成塔内战的真正解释,因为这些原因在其他中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然而其他中亚四国均未发生内战。可见这些因素虽然催生了塔内战,但它们不能构成解释为什么塔发生了内战而其他国家没有发生内战的真正原因。以吉尔吉斯为例,独立前后,吉同样面临中央权威降低、族群冲突爆发、地区主义抬头、宗教势力兴起等问题,然而吉并未爆发内战。

① Dov Lynch, "The Tajik Civil War and Peace Process," *Civil Wars*, Vol. 4, No. 4, 2001, pp. 49 - 72;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 13, No. 2, 2002, pp. 219 - 223.

② 见 Barnett R. Rubin, "Russian Hegemony and State Breakdown in the Peripher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ivil War in Tajikistan," in Bhavna Dave, ed., *Politics of Modern Central Asia: Institutions, Informal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s of Promoting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0), pp. 122 - 134.

③ 见 Alexandre Bennigsen and Chantal Lemerrier-Quelquejaye,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67), pp. 21 - 22; Alexandre Bennigsen and S. Enders Wimbush, *Muslims of the Soviet Empire: A Guid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1; Boris Rumer, *Soviet Central Asia: A Tragic Experiment*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quote from Idil Tuncer-kilavuz, *Understanding Violent Confli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August 2007, p. 2; Aleksei Malashenko, "Islam, Politics, and the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42, No. 4, July - August 2004, p. 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entral Asia: Islamist Mobiliz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Asia Report*, No. 14, March 1, 2001.

要对塔吉克爆发了内战而其他国家没有发生内战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必须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克拉伍兹对塔吉克爆发了内战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比较的对象是独立初期塔吉克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不同的政治发展动力，着重考察两国政府与反对派间互动对两国不同政治发展轨迹产生的影响。克拉伍兹发现，独立初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政府认为自己的实力不足以消灭反对派，因此采取双重策略：其一是采取融合政策分化瓦解反对派，将愿意合作的反对派纳入政府控制之下；其二是对强硬的反对派进行打压，使之无力与政府抗衡。^① 这两种策略的结合，使卡里莫夫政权有效消除了反对派带来的权力挑战和内战威胁。在塔吉克，决策者认为自身有足够实力消灭反对派，反对派也认为自身有足够实力颠覆政府，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导致内战爆发。克拉伍兹得出结论：政府与反对派在互动中对自身和对手实力的错误认知导致内战在塔吉克爆发，而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政府和反对派在较准确地评估自身实力的基础上通过采取明智的策略，避免了内战的发生。^②

与上述解释塔吉克内战之所以爆发的历史、地区主义与意识形态斗争三类解释相比，克拉伍兹的比较研究更为严谨，科学性程度较高。不仅如此，因为综合了上述三类解释的洞见，克拉伍兹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其结论的说服力。然而克拉伍兹研究的不足在于：首先，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来说明为什么塔吉克敌对双方的估计有误，而乌兹别克斯坦冲突双方的估计正确。^③ 其次，研究结论过于简单，以至其所揭示的内战原因仅来自于敌对方一次性的正误判断，这是对历史事实的过分简化，与塔吉克内战爆发或乌兹别克斯坦得以避免内战的实际过程并不吻

① Idil Tuncer-Kilavuz,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A Comparison of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2, March 2011, p. 274.

② Idil Tuncer-Kilavuz,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pp. 276-277; Idil Tuncer-Kilavuz, *Understanding Violent Confli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August 2007.

③ Idil Tuncer-Kilavuz,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Tajikistan's Civil War: Network Activation and Violence Specialist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7, No. 5, 2009, pp. 693 - 717.

合。再次,缺乏对独立之初塔吉克与乌兹别克斯坦权力分配变迁过程的分析,而这种权力变迁过程构成塔吉克内战爆发的重要背景。最后,未对塔内战爆发的过程进行深入考察,导致其得出的结论并不准确。

(二) 俄罗斯的态度决定了内战是否会在塔、吉爆发?

另一种竞争性的解释认为,俄罗斯对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政局的影响是塔、吉两国是否发生内战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塔吉克之所以出现内战,是因为塔内战发生之时俄罗斯没有进行强力干预;而吉的两次政治动荡未演变为内战,是因为作为吉盟国的俄罗斯不希望吉出现内战,正是俄罗斯基于这种认识进行的干预避免了吉内战的爆发。

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在认同俄罗斯对中亚小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我们必须明确,俄罗斯的强大影响力并不是决定中亚国家政局发展方向的唯一力量。受自身财政实力限制和中亚国家政局发展方向不明的影响,俄罗斯不可能在中亚小国一有风吹草动就进行强力干预。特定情况下俄罗斯干预中亚事务能力的局限性与意愿的缺乏,为中亚小国处理自身问题或维持一定的政策自主性提供了空间。具体到塔吉克内战与吉尔吉斯动乱问题上,我们不仅需要考察俄罗斯对中亚小国具有强大影响力这一总体事实,还需考察塔、吉两国动乱发生时,俄罗斯是否有对这种动乱进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在塔、吉两国发生政治动乱之初,俄罗斯的应对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缺乏对政治动乱进行干预的政治意愿,即使它具备强力干预的能力。首先看塔吉克内战。俄罗斯对塔吉克内战的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1年至1992年9月,这一阶段俄罗斯的主要任务在于处理国内事务和加速实现与西方的融合,对于塔内战,俄持一种忽视的态度,几乎未表现出干预的意愿,仅仅呼吁塔内战各方应尽快恢复法律与秩序。第二阶段是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7月,这一阶段俄罗斯意识到塔内战对整个中亚及自身利益带来的威胁,协同其他中亚国家以维和的名义组建了一支中亚维和部队,并向塔内战一方(拉赫蒙政府)提供

了大量的军事支持。在第三阶段，因为军事干预的效果不明显和维和给俄罗斯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加上拉赫蒙政府的支持基础日渐薄弱，俄罗斯改变了第二阶段明确支持内战一方的做法，开始敦促内战双方展开谈判。^①由此可见，俄罗斯对塔内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冲突发生后的维和阶段，而非冲突预防阶段。^②因此，塔内战的发生主要是塔内部发展动力决定的，俄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内战爆发之后。

其次是俄罗斯对 2005 年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的应对。2005 年“郁金香革命”发生时，由于吉局势发展比较迅速（主要是 3 月 13—24 日），尤其因为俄罗斯在应对乌克兰“橙色革命”上遭遇重大挫折，^③使俄罗斯在应对吉政局发展时持谨慎态度，避免直接介入。^④俄罗斯总统普京直到“郁金香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天才第一次发表对吉尔吉斯事件的看法，认为“革命”后的吉临时政府“将会帮助发展吉尔吉斯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为确立双方政府间关系作出努力”。^⑤俄罗斯对吉“郁金香革命”的镇静，也与克里姆林宫相信吉尔吉斯外交取向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郁金香革命”为什么没有演变为内战，同样需从吉的内部发展动力方面去解释。

最后，俄罗斯对 2010 年吉尔吉斯“4·7”事件及后来的族群冲突进行

① 俄罗斯对塔内战立场的转变情况，可参考 Dov Lynch, *Russian Peacekeeping Strategies in the CIS: The Case of Moldova, Georgia and Tajikista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p. 150–172。

② Lawrence P. Markowitz,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Agency: Post-Soviet State Building in Tajikistan”, in Emilian Kavalski, ed., *Stable Outside, Fragile Inside? Post-Soviet Statehood in Central Asia* (Burlington: Ashgate, 2010), pp. 158–172。

③ 俄明确支持乌克兰亲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而非反对派代表尤先科，拒绝与乌反对派进行接触，导致尤先科当选总统后乌克兰采取亲西方立场。

④ Robert Horvath, “Putin’s ‘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Spectre of Velvet Revolut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1, 2011, pp. 1–25; Jeanne L. Wilson, “The Legacy of the Color Revolutions for Russi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 No. 2, 2010, pp. 21–36; Andrey Makarychev, “Russia, NATO, and the ‘Color Revolutions’ Discursive Traps,”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47, No. 5, 2009, pp. 40–51。

⑤ 俄罗斯对吉“郁金香革命”的具体应对见 Stefanie Ortmann, “Diffusion as Discourse of Danger: Russian Self-Representations and the Framing of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 3–4, 2008, pp. 363–378, 引言见 p. 370。

干预的意愿同样不高。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在吉“4·7”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证据主要来自2009年底至2010年初俄对巴基耶夫政权采取的诸多施压措施。^①对于这种质疑,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于2010年4月7日断然予以否认,他认为自己被吉尔吉斯事件的突然发生所震惊。普京在讲话中强调“4·7”事件是吉尔吉斯的内政。^②事实上,导致巴基耶夫离开吉尔吉斯的“4·7”事件只持续了不到十天(4月6—14日)。我们无从判断“4·7”事件与俄罗斯之间的真正关系(主要是俄罗斯是否策划了“4·7”事件),关键在于:当“4·7”事件已经演变成吉的族群冲突甚至有演变为内战的趋势时,俄罗斯为什么不及时予以介入。在2010年4月13日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时任俄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表示,吉的“当务之急是避免内战”,“我相信吉尔吉斯处于内战的边缘”。^③既然俄罗斯相信吉处于内战的边缘,那么俄就应该吸取塔吉克内战的教训,及早进行干预以避免内战。然而俄罗斯仅向吉提供了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增派了两个伞兵营抵达吉尔吉斯坎特空军基地,以保证基地内俄罗斯公民的安全。^④在6月10日吉尔吉斯发生大规模的族群骚乱后,吉临时政府总统奥通巴耶娃于6月12日请求俄罗斯派遣维和部队,并于6

① 事件的导火线被认为是玛纳斯空军基地问题。为换取吉尔吉斯将美军从玛纳斯空军基地驱逐出去,俄罗斯2009年承诺向吉尔吉斯提供20亿美元无息贷款,并免去吉1.8亿美元的债务并提供无偿援助。然而,巴基耶夫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见高飞《中亚博弈:冷战后的中美俄关系》,《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8页)。为了对巴基耶夫政权进行惩罚,2009年下半年至“4·7”事件期间,俄罗斯采取了一些报复性措施,这些措施被视为俄在“4·7”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证据。这些措施包括:俄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激烈批评,加强与吉反对派的联系,如反对派领导人奥通巴耶娃、阿塔巴耶夫、白鹰党领导人萨里夫等都在3月以后访问过莫斯科。此外,2010年3月,俄罗斯宣布向出口吉尔吉斯的石油产品征收新关税,这对于95%的石油产品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吉尔吉斯无疑是一项沉重打击。而俄罗斯较早承认由奥通巴耶娃领导的临时政府,也被视为一项证据(相关观点见http://www.rferl.org/content/Commentary_Roots_Of_Kyrgyzstan_Uprising/2022430.html)。

② 见http://www.rferl.org/content/Putin_Russia_Had_No_Role_In_Kyrgyz_Events/2005948.html。

③ 见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n_President_Warns_Of_Kyrgyz_Civil_War_Urges_START_Ratification/2011832.html。

④ 见http://www.rferl.org/content/Regional_States_React_To_Kyrgyz_Violence/2007868.html。

月 18 日再次请求俄派兵保护吉重要的基础设施，然而，俄罗斯拒绝了吉临时政府的干预要求，^① 对“4·7”事件及随后的族群骚乱持观望态度。

由此可见，在吉尔吉斯 2010 年的事件中，即使俄罗斯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施压与“4·7”事件的发生有一定关系，但在吉随后的政局发展中，即使承认吉面临内战威胁，俄罗斯依然未表达出进行干预的意愿。^② 吉尔吉斯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避免了内战，有效地维护了吉的国家主权。显然，对于吉尔吉斯为何得以避免内战的发生，需要从吉国内动力的方面进行解释。

如上所述，塔吉克爆发内战与吉尔吉斯经历“郁金香革命”、“4·7”事件两次政治动荡，尽管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轨迹有所差异，但它们面临两个相似的共同点，即它们的发生并非俄罗斯直接操纵的结果（“4·7”事件的发生是否有俄罗斯的直接作用现在仍不得而知）；而在政治动荡出现之初，俄罗斯均缺乏强力干预的愿望。对于塔吉克而言，内战的爆发是内部原因导致的结果；至于吉尔吉斯的动荡，在俄罗斯未进行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动乱没有演变为内战，不能归因于俄罗斯的干预或影响。这里的分析，并非否认俄罗斯对塔、吉两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力，^③ 只不过至少在塔吉克内战初期和吉 2005 年、2010 年两次动荡期间，俄罗斯并未表现出进行强力干预的意愿。因此，在选择这三个案例进行研究以回答为什么塔吉克发生了内战而吉尔吉斯没有发生这一问题时，需要着重考察的是导致中亚国家发生政治动荡的各种行为体的认知、实力分布、战略选择等因素。

① 见 <http://lenta.ru/news/2010/06/12/peacekeepers/>。

② 《吉尔吉斯陷入暴力漩涡 美俄袖手旁观》，见 <http://www.xjjb.com/html/news/2010/6/58365.html>。

③ 俄罗斯中亚政策的演变，可参考 Vladimir Paramonov, et al., *Russia in Central Asia: Policy, Security and Economic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10); Roy Allison, “Strategic Reassertion in Russia’s Central Asia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2, 2004, pp. 277 – 293; Andrei Kazantsev,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Sea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6, 2008, pp. 1073 – 1088。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与克拉伍兹的研究不同, 本文通过具体考察塔、吉两国政治动荡的历史背景和动乱的具体发展过程, 来分析为什么塔吉克发生了内战而吉尔吉斯没有。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在没有外界势力强力干预的情况下, 内战是否会爆发, 与内战各方是否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及能力息息相关。塔吉克内战前的敌对方既有内战的意愿, 也有从事内战的能力, 而吉尔吉斯两次动荡中的冲突方要么一方缺乏内战能力、要么一方缺乏内战意愿, 从而避免了内战在吉的出现。

内战的爆发, 既需要敌对双方具有内战的意愿, 还需敌对双方具有内战的能力。在关于内战的研究中, 主要有两种理论讨论导致内战出现的因素: 一类是被称之为怨恨理论, 一类是贪婪理论。^① 这两种理论往往针锋相对。怨恨理论主要关注基于族群多样性、宗族信仰、社会归属等因素而在不同行为体之间产生的敌对或怨恨;^② 而贪婪理论研究的是经济分配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对内战带来的影响。^③ 除了这两种理论, 有些研究关注地理分布、^④ 国家失败、^⑤ 意识形态对抗、人口结构等因素对内战出现可能具有的影响。如前所述, 在解释塔吉克内战和吉尔吉斯

① 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Lynne Rienner, 2000) .

② Ibrahim Elbadawi and Nicholas Sambanis,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3, 2002, pp. 307 – 334.

③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April 26, 2010,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Berkeley;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Evidence and Analysis (Vol. 1: Africa)*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5);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Evidence and Analysis (Vol. 2: Europe, 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5) .

④ Halvard Buhaug and Scott Gates, “The Geography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4, 2002, pp. 417 – 433.

⑤ Ann Hironaka, *Neverending Wa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ak Stat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动乱问题上，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它们共同构成这两国政治发展区别于其他中亚国家的背景因素。不过，它们并不能有效说明为什么塔吉克发生了内战而吉尔吉斯没有发生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导致内战是否会出现的必要因素，即敌对方是否具备进行内战的意愿和能力上。为了分析塔、吉动乱期间敌对方进行内战的意愿，可以根据前景理论作出判断；至于敌对方是否具有进行内战的能力，我们着重考察敌对方能否获得进行内战的武器。鉴于敌对方能否获得武器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在进行案例分析时再进行探讨。这里着重讨论如何衡量敌对方从事内战的意愿。

内战爆发前敌对方是否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可根据前景理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前景理论的要义是行为体在以当前满意状态而非最终结果为零点的坐标图上，考察人们对既得利益与新得利益的反应来推断其对风险的寻求与规避倾向。前景理论的创始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指出“决策者的政策决定都出自于对风险与成本的综合性考虑。”^①他们认为，由于现实生活中信息的不完全，人不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只具有有限理性。在有限理性的指引下，决策主要由对风险与成本的综合权衡而决定。^②在这种背景下，行为体的决策特征表现为：1. 在面临收益时会选择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2. 在面临损失时会选择风险寻求（risk seeking）；3. 人们往往会高估低概率事件而低估中高概率事件。这三个结论都建立在决策者更加关注变化程度而非变化结果的基本假设上。

根据前景理论的框架和分析方法，把上述结论引入对内战意愿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个假设：A. 决策者往往以当下自己满意的情况为参照点，设参照点为0，满意度 >0 视为获利；满意度 <0 ，视为损失。B. 当决策者面临损失时，倾向于冒险，从而产生进行内战的意愿；当决策者面

①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New Series*, Vol. 211, No. 4481, Jan. 30, 1981, p. 453.

②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临获利时，倾向于妥协，内战的意愿并不明显。C. 如果内战一方具有内战的意愿，而另一方没有内战的意愿，那么双方的内战意愿都会降低或消失。D. 内战爆发的可能性，随着敌对双方都产生内战的意愿而急剧升高。由此，设敌对双方为 A、B，可得内战前夕敌对双方内战意愿的解释框架（见表 1）。

表 1 内战意愿的解释框架

B \ A		
	损失(既得利益/既定目标)	获利
损失(既得利益/既定目标)	双方均有内战的意愿	A 无内战的意愿,B 有内战的意愿
获利	B 无内战的意愿,A 有内战的意愿	双方均无内战的意愿

注：①当双方都面临损失但有一方以上认为不能挽回损失而选择规避时，内战也不会爆发。
②妥协的底线是妥协方的既得利益不被侵犯。

在上述关于内战意愿的解释框架中，当敌对双方 A 与 B 都均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过程中自己会面临损失时，那么双方均会产生内战的意愿。反之，当双方都认为自己在将来会获益，那么它们彼此的敌意会大为降低，双方便都不具备进行内战的意愿。然而，当 A 与 B 中有一方面面临损失、而另一方面面临收益时，面临获益前景的一方从事内战的意愿会降低，但面临损失的一方则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获益方往往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平息受损方的怨恨或敌意，只要这种让步不足以威胁到前者在互动前一阶段的收益。也就是说，在第二与第三种情况下，当一方愿意妥协时，会消除双方进行内战的意愿。

当敌对双方 A 与 B 都具有内战的意愿时，内战并不必定出现，因为还必须考虑双方内战能力的问题。当把内战的意愿和内战能力结合起来考虑时，就得到了本文的分析框架（见表 2）。当敌对双方 A 与 B 既有内战的意愿又有从事内战的能力时，一旦相应的结构性因素出现，那么内战肯定会爆发。当敌对双方既没有从事内战的意愿也没有从事内战的能力时，即使存在有利于内战出现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至于演变为内战。在敌对双方缺乏从事内战相应能力的情况下，即使双方具备进行内战的意愿，也不

会出现内战。^① 至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进行内战的意愿但无从事内战的能力时，该国同样不会出现内战。不过这两种没有出现内战的状况是不稳定的，它只能持续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战是否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爆发，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的演变、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敌对双方的互动过程等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区分的内战意愿的有无，是指双方的意愿，而非一方有意愿而另一方无意愿的情况。因为上文已经指出，当敌对双方一方有内战意愿而另一方无内战意愿时，往往会演变为无内战意愿一方的妥协，从而消除另一方的内战意愿，最后会演变为双方均无内战意愿的情况。就本文考察的案例——塔吉克内战与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4·7”事件——而言，塔吉克内战属于图中第一类情况，而吉的“郁金香革命”则属于第三类情况，“4·7”事件属于第二类情况。

表 2 内战是否爆发的解释框架

内战意愿 \ 内战能力	内战能力	
	有	无
有	内战(第一类)	无内战(第二类)
无	无内战(第三类)	无内战(第四类)

三、为什么塔吉克爆发了内战？

塔吉克内战持续了五年时间，涉及塔吉克国内许多行为体与某些外部

① 在第二与第三类情况下，可能出现族群冲突、种族清洗、恐怖主义等现象，因为双方或一方缺乏从事内战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伤害对方的能力。弱者可能以恐怖主义等手段伤害强者，而强者则可以对弱者实施种族灭绝等暴力伤害。这两类没有导致内战产生的情况（尤其是第二类）并不稳定。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种族灭绝经过一段时期总会引起干涉，从而导致双方内战能力的提升。若局势得不到改善，内战就有可能爆发。鉴于本文只考察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这一情况不予考虑。

力量。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停止活动。此后,苏联共产党的解散,对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国内政局的稳定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① 苏共解散后,塔共失去了后盾,塔反对派对塔共及其代表的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势力长期掌权的不满,加之民主党、伊斯兰复兴党等对塔共的仇视,导致塔吉克很快陷入内乱。塔吉克内战使约5万人丧命,约50万人沦为难民。^② 同时,内战还造成塔吉克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使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③ 鉴于本文主要考察塔吉克内战之所以爆发的原因,这里主要分析塔内战正式爆发之前到1992年12月塔政府军重新占领首都杜尚别这段时间内塔吉克的政治发展过程。

在塔吉克内战爆发过程中,以下几个事件极大地激化了矛盾,促进了内战的爆发。^④ 首先是1990年2月,塔民族主义政党红宝石党在杜尚别发起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苏联将一批亚美尼亚难民安置在杜尚别,抗议者还将矛头指向了塔共总书记。在政府协调未果后,政府使用武力,导致26人死亡和127人受伤。抗议被称之为“二月暴动”,它拉开了塔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序幕。其次是1991年11月,纳比耶夫当选总统后将重要的政

① 参见 Barnett R. Rubin, “Russian Hegemony and State Breakdown in the Peripher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ivil War in Tajikistan,” in Bhavna Dave, ed., *Politics of Modern Central Asia: Institutions, Informal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s of Promoting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0), pp. 122–134.

② Payam Foroughi, “Tajikistan: Nationalism, Ethnicity, Conflict,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Source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22, No. 1, 2002, p. 1; Human Rights Watch/Helsinki (HRW/H), *Tajikistan: Tajik Refugee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Vol. 8, No. 6D, May 1996, p. 5.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塔内战导致约10万人丧生,100万人沦为难民,见 A. I. Kuzmin, “The Causes and Lessons of the Civil War,” in Alexei Vassiliev, ed., *Central Asi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n the Post-Soviet Era* (London: Saqi Books, 2001), p. 175.

③ 李静杰、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 中亚和外高加索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④ 关于塔吉克内战的具体演进过程,可参考 Iraj Bashiri, “A Comprehensive Chronology of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 and Iran,” <http://www.angelfire.com/rnb/bashiri/CHRON/To96.html>; Sayfiddin Shapoatov, *The Tajik Civil War: 1992–1997*, Master Dissertation,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4, pp. 15–23; Kirill Nourzhanov, “Saviours of the Nation or Robber Barons? Warlord Politics in Taji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4, No. 2, 2005, pp. 109–118.

府职位分配给列宁纳巴德人以及部分库利亚布人，并分别于 1992 年 2 月 6 日逮捕了民主党领导人伊卡洛莫夫（Maqsud Ikromov）、2 月 11 日逮捕了红宝石党领导人之一米拉希莫夫（Mirbobo Mirrahimov），从而引起加尔姆和帕米尔人的强烈不满，政府与反对派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再次是 1992 年 3 月 26 日，反对派支持者在杜尚别的目击者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要求索格特人、最高苏维埃主席肯嘉耶夫（Safarali Kenjaev）和整个议会辞职，提出确立多党体系、重新进行议会选举、拟定新宪法等一系列要求。斋月结束后更有 5 万名农村居民支持者涌入目击者广场支持反对派。而支持政府的力量开始在自由广场集会，抗议反对派反对政府。最后，1992 年 4 月 25 日，数千名库利亚布的政府支持者在库利亚布人萨法罗夫（Sangak Safarov）的组织下来到杜尚别，支持纳比耶夫政府。5 月 1 日，总统纳比耶夫发布命令，筹建总统卫队，并向自由广场上的政府支持者提供了 2000 支（也有说法是 1800 或 1700 支^①）步枪，同时卫队开始对目击者广场上的反对派支持者使用武力。双方发生冲突，内战爆发。

塔吉克内战的爆发，有一个长达两年的互动过程，这些过程的相互作用最后导致内战的爆发。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塔内战冲突双方视为塔吉克联合反对派与塔吉克人民阵线，以此提炼塔内战爆发的原因。本文的观点是，塔内战的发生，是冲突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既具有从事内战的意愿同时具备内战的能力，在此情况下，最后将塔吉克拖入内战。下文我们依次对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塔冲突双方进行内战的意愿

塔吉克独立前后权力分配的失衡，为塔内战的爆发提供了前提条件。1990 年 11 月，塔实行总统制。改行总统制后，塔吉克中央政权趋于集中，总统取代了代表塔吉克政府最高权威的“部长会议”，将原属多个部

^① 分别参考 Irina Zviagelskay, “The Tajik Conflict,” http://www.ca-c.org/dataeng/st_09_zvjag_3.shtml; Kirill Nourzhanov, “Saviours of the The Nation or Robber Barons? Warlord Politics in Tajikistan,” p. 115.

门的权力集于一身。根据 1990 年 11 月的塔吉克宪法修正案,总统还同时兼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直接隶属于总统的总统委员会把持着塔内部的各个部门,最高苏维埃主席则沦为总统委员会的一员。^① 塔吉克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远大于传统三权分立制下的总统权力,在各方面享有最高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传统上塔内部各州市的中心,列宁纳巴德州自然将总统一职视为囊中之物。凭借在中央政权中的绝对优势地位,1990 年 11 月 29 日,塔吉克共和国第 12 届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来自列宁纳巴德州的塔共中央第一书记马赫卡莫夫 (Kakhal Makhkamov) 为共和国第一位总统。至此,列宁纳巴德州势力把持了几乎整个中央政权,余下不多的中央部委权力则分给了库里亚布州。

面对列宁纳巴德州势力不断扩张而自身权力不断被压缩的局面,原本希望能在总统制下分享权力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等州市对新政权产生强烈不满。与此同时,新诞生的塔吉克共和国^②通过了关于宗教解禁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这使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影响日益扩大,《伊斯兰真理》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杂志风靡塔吉克。此外,塔吉克属波斯文明,受伊朗影响颇深,早在 1989 年,伊朗便通过各种途径将带有深厚波斯文明色彩的伊斯兰教思想拓展到塔吉克境内,进一步促进了塔吉克伊斯兰教的复兴。^③ 值得注意的是,塔宗教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是东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地区,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所在地。与戈尔诺-巴达赫尚州在中央政权中既得利益受损而产生的对塔新政府的强烈不满相结合,在塔吉克境内活动已久的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帕米

① 刘启芸编《塔吉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75 页。

② 此处的“新塔吉克共和国”是指 1990 年 8 月 24 日发表主权宣言后的塔吉克共和国,这代表了塔吉克开始真正地行使自身主权。

③ 关于伊朗对塔吉克宗教发展趋势和伊斯兰极端组织活动的影响参见 Shahram Akbarzadeh, “Why Did Nationalism Fail in Tajikista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7, 1996, pp. 1105–1129; Muhammad Reza Djalili and Frédéric Grare, “Regional Ambitions and Interests in Tajikistan: The Role of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n,” in Mohammad-Reza Djalili, et al., eds., *Tajikistan: The Trial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 119–131.

尔运动”等组织在塔东南部聚合，召集各方反对势力挑战塔新政府和塔共的权威。在新一轮中央政权分配中既得利益的损失，共同促成了帕米尔、戈尔诺－巴达赫尚等在新政权中失势州市的联合，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塔 1991 年 11 月总统选举后，塔吉克民主党、红宝石党、伊斯兰复兴党在杜尚别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实力的上升增强了进行政治斗争的资本。他们在抗议中提出的修改宪法、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确立多党制等要求，在纳比耶夫已当选总统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一种保守和谨慎的策略，它们的目标是结束列宁纳巴德在塔吉克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由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掌控政权。

对于反对派的上述要求，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断然予以拒绝。马赫卡莫夫被迫辞职后担任总统的阿斯洛诺夫（Qadriddin Aslonov）、纳比耶夫（Rakhmon Nabiyeu）都来自列宁纳巴德州。阿斯洛诺夫因为取缔塔共和没收塔共的财产而被强硬派罢免；纳比耶夫则对反对派持强硬政策。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对反对派的日趋强硬，对决策者而言是一种理性选择。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塔吉克中央政权的掌控者，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早已将中央政权视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获得新政权中的总统一职是这种既得利益的体现，因为自 1946 年起塔共总书记就一直出自列宁纳巴德州。反对派提出的要新政府让渡部分权力并建立多党制国家或由加尔姆、帕米尔主导政权的要求，无异于对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既得利益的剥夺。从前景理论的推断来看，决策者在面临既得利益丧失的前景时，会倾向于采取冒险的策略以规避损失。事实上，1992 年 5 月，反对派与纳比耶夫政府已经组建了联合政府，然而共产党势力强大的库里亚布因无法接受肯嘉耶夫（Safarali Kenjaev）和副总统——他们两人原本都是纳比耶夫的左膀右臂——的辞职，以及帕米尔人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占据了最高苏维埃其他高级职位，所以不承认联合政府，并向杜尚别发起攻击。从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上被解职的肯嘉耶夫，作为一名列宁纳巴德人，在解职后他同样不承认联合政府，而是与库里亚布结盟，和反对派作战。这充分说明了塔内战既得利益者接受损失时的艰难。

就反对派而言,倾向于冒险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纳比耶夫的上台,意味着面临反对派的挑战,塔吉克政府最终选择了强硬路线。尤其是1991年11月纳比耶夫上任后对反对派的攻击,如逮捕塔吉克民主党领导人、杜尚别市长卡洛莫夫和红宝石党领导人,无疑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①当肯嘉耶夫指控内务部长、帕米尔人纳万朱万诺夫(Mamadayoz Navjuvanov)侵吞国家财产和滥用职权并迫使后者于1992年3月25日辞职时,在帕米尔人和加尔姆人看来,列宁纳巴德和库利亚布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在政府机构中本就不多的权力。该事件导致300多名帕米尔青年在3月26日于塔吉克中央委员会前抗议,并提出一系列让列宁纳巴德和库利亚布人无法接受的要求,如让肯嘉耶夫和整个议会辞职、确立多党体系、重新进行议会选举、拟定新的宪法等。当反对派认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即原来在中央政权中仅有的部分权力被纳比耶夫剥夺时,为了避免这一损失,选择冒险同样是一种理性的策略。其次,宗教政治组织的加入也使反对派势力大增。在3月25日至4月1日的抗议中,抗议者从数百人增加到5万余人,这些抗议者主要来自于斋月结束后的穆斯林信徒。实力的增强,导致反对派预期不仅可以避免既有的损失,而且还能获得额外的利益。

反对派将夺取国家政权视为自身的政策目标,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以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为核心的政府方的猜忌,政府方对反对派掌权要求的拒绝,进一步激怒了反对派。当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既得利益遭到对方行为的损害,双方就都具有了进行内战的意愿。在政府仍然具备较强支持基础的时刻,1992年4月初的抗议,随即演变成反对派支持者和政府支持者在杜尚别两个广场——反对派支持者占据了目击者广场,而政府支持者占据了自由广场——之间的武力对抗。当纳比耶夫将2000支步枪发放给政府支持者和命令新组建的总统卫队向反对派支持者开枪时,内战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

① Shahram Akbarzadeh, "Why Did Nationalism Fail in Tajikistan," pp. 1110-1111.

（二）塔敌对双方进行内战的能力

在塔吉克地区权力分配不公这一结构性条件下，局势发展带来的损失前景使冲突双方都有了进行内战的意愿。不过，使塔吉克内战最终爆发的关键因素在于，双方都具备了从事内战的能力。在能力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武器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塔吉克只有内务部队维持国内秩序，而没有大规模成建制的军队。在苏联时期的军队管理上，塔吉克隶属于苏联的突厥斯坦军区，不过该军区于 1992 年 6 月被撤销。随着苏联解体，塔吉克尝试建立自己军队的征兵制计划流产。^① 在没有军队和敌对双方均有进行内战意愿的情况下，敌对双方能否获得武器，就构成内战能否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里不是否认战斗人员的重要性，只是考虑到塔内战前敌对双方都具有较强的支持基础，对此已有人做过比较详细的研究，因此本文不作详细讨论，^② 而将考察重点放在敌对双方武器的获得上。

塔吉克内战双方武器的获得，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政府相关机构发放的武器。内战爆发前，塔吉克虽然没有军队，但是拥有自己的警察和安全力量。这些机构拥有的武器，成为内战双方武器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武器的发放主要集中在 1992 年 5 月。因此，塔内战在当年 5 月爆发并非偶然。政府机构向其支持者发放枪支，最典型的是塔总统纳比耶夫向库里亚布军阀萨法罗夫（Sangak Safarov）率领的政府支持者发放 2000 支步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塔负责国内秩序的各种机构具有不同的效忠对象。如塔内务部部长纳万朱万诺夫是帕米尔人，他支持反对派。虽然他于 1992 年 3 月 25 日被解职，但内务部依然支持反对派；此外，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支持反对派而非政府。而塔吉克国家安全局因为由肯嘉耶夫控制过，所以其效忠对象为政府。效忠对象不同的安全力量，很自然向各自的支持者提供武器。早在 1992 年 5 月 2 日，哈特隆州的科法尔尼洪

① “Tajikistan Civil War 1992 – 1994,” <http://www.onwar.com/aced/data/tango/tajik1992b.htm>.

② Idil Tuncer Kilavuz,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Tajikistan’s Civil War.”

(Kofarnihon) 警察局就向帕米尔军事力量提供了 275 支步枪, 180 支手枪、10 辆装甲车。而主要由帕米尔势力构成的内务部独立营, 原本被派往库尔干秋别以阻止库里亚布人和帕米尔人交火, 但它却成为攻击库里亚布人的力量。1992 年 5 月至 6 月, 塔吉克警察要么以个人身份, 要么以成建制的方式加入敌对中的一方。^① 到 1992 年 7 月间, 杜尚别已无安全力量效忠中央政府。这是纳比耶夫不得不向反对派作出让步以组建联合政府, 然后逃到俄罗斯 201 摩托化步兵师避难, 最后在机场被反对党抓住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 塔内战于 1992 年 5 月爆发并不是偶然, 因为正是在 5 月前后, 政府支持者和反对派均从相关政府机构那里获得了从事内战的武器。

二是走私来的武器。塔吉克内战中有许多犯罪集团介入。库里亚布军阀萨法罗夫就是其中的典型。萨法罗夫因谋杀等指控而在监狱中服刑 23 年, 因为他的关系、阅历、年纪等因素, 他在库里亚布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而他的追随者从纳比耶夫那里获得的 2000 支步枪, 构成他从事内战的重要基础。除了萨法罗夫, 反对派也利用犯罪组织来挑衅政府和进行内战。有研究指出, 掀开塔吉克内战序幕的 1990 年“二月暴动”, 就是四个对塔共书记马赫卡莫夫不满的犯罪组织煽动起来的。再如 1992 年 5 月, 由 13 个犯罪团伙组成的“杜尚别青年人”组织向纳比耶夫宣战, 这些犯罪团伙均装备精良。^② 他们的武器, 主要是从阿富汗走私而来。除了阿富汗, 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尔希 (Karshi) 的武器黑市, 也是塔吉克内战武器的重要来源, 因为该地有苏联第 40 军撤出阿富汗时遗留的一个武器库。^③ 除了从黑市上购买, 还有军阀通过私人渠道从邻国购买武器。^④ 塔吉克内战前夕政局不稳, 为阿富汗和邻国武器流入塔吉克提供了便利, 增强了敌对

① Kirill Nourzhanov, “Saviours of the Nation or Robber Barons? Warlord Politics in Tajikistan,” pp. 114 – 115.

② Ibid., p. 115.

③ Ibid., p. 127, note 16.

④ Ibid., 120.

双方进行内战的能力；内战的展开又进一步恶化了塔国内形势，进而让更多武器流入塔吉克，两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加强自己的边防和俄罗斯增派更多兵力驻守在塔阿边界，外部武器的流入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三是内战双方抢劫而来的武器。抢劫武器的对象，主要是敌对方和俄罗斯驻塔部队。如 1992 年 10 月 8 日和 24 日，肯嘉耶夫的部队先后两次抢劫了雷加尔（Regar）内务局，将枪支弹药洗劫一空。^① 内战爆发后，虽然缴获对手武器是获得武器的捷径，但内战初期，武器抢劫的对象，往往是俄罗斯驻塔部队的装备。如库尔干秋别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兹别克人胡多别德耶夫（Mahmud Khudoberdyev），就在内战初期从俄罗斯驻塔 201 摩托化步兵师那里抢来了几辆坦克。^② 当然，这种“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军队的“送”。塔内战爆发后一直到 1992 年 9 月，俄罗斯持一种观望态度，要求 201 摩托化步兵师保持中立，避免介入塔内战。不过，201 摩托化步兵师的中立是形式上的。尽管该师并未参战，但它有自己的倾向性，那就是支持列宁纳巴德——库里亚布一方。这主要是因为：201 摩托化步兵师的族群构成非常多元，而且所募人员很多来自塔吉克。内战一爆发，立即威胁到步兵师军官与士兵家属及他们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中立的表面下，他们希望政府军一方获胜，而向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则是支持政府一方的有效手段。^③ 等到俄罗斯正式干预塔内战，俄才公开向政府一方提供武器；不过通过收缴和购买，反对派同样获得了一定数量的俄罗斯武器。无论是从敌对方还是从俄罗斯驻塔部队处获得的武器，客观上都加剧了塔吉克内战的烈度。

总之，在敌对双方已有内战意愿的情况下，武器的获得为内战的进行

① Iraj Bashiri, “A Comprehensive Chronology of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 and Iran,” <http://www.angelfire.com/rnb/bashiri/CHRON/To96.html>.

② Kirill Nourzhanov, “Saviours of the Nation or Robber Barons? Warlord Politics in Tajikistan,” p. 115.

③ Irina Zviagelskaya, “The Tajik Conflict,” http://www.ca-c.org/dataeng/st_09_zvjag_3.shtm; “Tajikistan Civil War 1992 – 1994,” <http://www.onwar.com/aced/data/tango/tajik1992b.htm>.

提供了关键性的驱动力。除上述三个主要途径外,塔敌对方武器的获得还有其他渠道,只是这些渠道对内战的爆发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如在1992年8月至9月间,有大约600至650名阿富汗军阀杜斯塔姆的士兵进入塔吉克,帮助萨法罗夫作战;同时大约有500—600名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ojahedin)的士兵帮助反对派。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在塔吉克内战已经爆发的背景下,延续了内战的持续时间。^①塔吉克内战涉及多个外部行为体的参与。如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支持塔吉克的反对派。^②而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为了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在塔吉克的影响,继续支持由列宁纳巴德和库里亚布州主导的塔新政府。不过,除了阿富汗、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其他域外国家对塔内战敌对方的支持均不是很明确。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有域外国家在塔内战爆发前向敌对方提供大量武器。这意味着,塔内战的爆发主要还是塔内部动力发展所致。至于内战后外部势力的支持,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内战的结束。如由于阿富汗的支持,反对派于1993年3月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卢坎(Taloqan)成立了流亡政府,与塔吉克中央政权展开局部斗争。^③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原本在1992年底行将覆灭的反对派与塔吉克中央政府对抗了五年。直至1997年7月,这一场使近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内战才得以结束。

塔内战的爆发,是敌对双方既有内战的意愿,也有内战能力带来的结果。就意愿而言,敌对双方都认为自身的既得利益被对方侵蚀,正如前景理论所预测的,在这一情况下敌对双方都选择了冒险。至于

① Kirill Nourzhanov, "Saviours of the Nation or Robber Barons? Warlord Politics in Tajikistan," p. 116.

② 有关外部势力对塔吉克反对派的支持参见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entral Asia: Islam and State," *Asia Report*, No. 59, July 10, 2003, pp. 14-2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entral Asia: Crisis Conditions in Three States," *Asia Report*, No. 7, August 7, 2000, pp. 8-10; Barnett R Rubin, "Central Asia and Central Africa: Transnational Wars and Ethnic Conflict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7, No. 1, 2006, pp. 9-10.

③ 李静杰、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 中亚和外高加索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内战的能力，起主导作用的是敌对双方武器的获得，这一因素在一个独立时没有军队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国家安全机构支持、国外走私，以及抢劫，敌对双方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武器，这些武器最终将塔拖入内战当中。

四、吉尔吉斯的两次政治动乱为什么没有升级为内战？

通过回顾吉尔吉斯 2005 年和 2010 年两次政治动乱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郁金香革命”与“4·7”事件的前期演变过程与塔吉克内战极为相似。因为指控选举舞弊，吉跟塔一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抗议活动中，反对派提出了总统辞职等要求；反对派的抗议同样引发政府支持者间的反抗议活动，双方同样发生了冲突。然而，塔吉克的动乱最终演变为内战，而吉尔吉斯的两次动乱均以总统逃离该国告终。^① 为此需要分析的是，塔吉克的动乱与吉尔吉斯斯坦两次动乱的发展动力到底有何区别，以致它们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一）吉动乱期间冲突双方进行内战的意愿

吉尔吉斯的两次动乱，往往被西方媒体冠之以“革命”的名称。不过，通过对这两次动乱的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浓厚的南北权力斗争的色彩，而最后带来的政权更迭不过是南北方权力的转移或再平衡。这种权力交接与塔吉克内战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吉尔吉斯两次动乱中冲突双方的内战意愿和内战能力与塔吉克有重大差别，最终导致它们的结

^① 吉 2005 年“郁金香革命”的演进过程可参考 Erica Mara, “The Tulip Revolution: Kyrgyzstan One Year After (March 15, 2005 – March 24, 2006) ,” <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Jamestown-TulipRevolution.pdf>; Martin Henningsson, “The ‘Tulip Revolution’ in Kyrgyzstan-Revolution or Coup d’état?” <http://www.forumsyd.org/upload/tmp/uppsats/TheTulipRevolution.pdf>; 吉 2010 年“4·7”事件的演进过程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0_Kyrgyzstani_revolution。

果出现重大差异。

1. 2005 年吉“郁金香革命”中南北双方的内战意愿

首先看“郁金香革命”。在 2005 年的动乱中, 尽管在吉尔吉斯西北部的塔拉斯州也发生了抗议活动, 但政府反对派的政治据点和抗议重点在南部, 即包括奥什、贾拉拉巴德和巴特肯在内的三个州。而吉总统阿卡耶夫来自北部, 因此“郁金香革命”蒙上了南北对抗的色彩, “郁金香革命”的成功, 不过是南北政治精英间的一次权力交接。有中亚问题专家在“郁金香革命”后指出“吉尔吉斯巩固民主的机会非常渺茫, 因为‘郁金香革命’仅仅是由一批政治经验更为稚嫩的精英代替了一批先前的共产党官员、由一批更为褊狭的南部精英代替了北方精英。”^① 对“郁金香革命”的发展过程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斯科特·瑞尼兹 (Scott Radnitz) 也指出“吉尔吉斯并未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指未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转型或改变), 甚至算不上一场制度变迁。吉尔吉斯所发生的, 从所有迹象来看, 只不过是一场有限的权力转移。”^② 研究者们均注意到, 与 2003 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不同, 2005 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 碎片化的反对派之所以能团结起来实现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目標,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部精英有效动员了庇护网络、部族等传统社会资源。^③ 也就是说, “郁金香革命”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地区精英的机会主义态度, “选举前高度分化的反对派, 在面临一场有缺陷的选举时, 抓住了这一机会之窗, 组建了由地区精英和政府内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临时联盟, 向国家政府表达了它们的

① Charles H. Fairbanks, Jr.,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1, 2007, p. 55.

② Scott Radnitz,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Kyrgyzst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2, 2006, p. 133.

③ 可参考 Matthew Fuhrmann, “A Tale of Two Social Capitals: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in Kyrgyzsta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6, 2006, pp. 16 – 29; Azamat Temirkulov, “Inform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 Mobilization: The Periphery in the ‘Tulip Revolution’,” in Sally N. Cummings, 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93 – 111.

地区怨恨”。^①

问题在于，既然“郁金香革命”前期发展过程与塔吉克内战的前期发展过程很相似，为什么这次政治动乱没有演变为内战？为此，我们需要对北方（吉政府）与南方（反对派）进行内战的意愿进行考察。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南方惨败，南部势力成为议会中的少数派。按照吉尔吉斯宪法，即便由南方阵营的人出任总理，也会由于在议会中的势力薄弱，丧失与总统抗衡的实力，从而导致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吉国家稳定的南北分权模式被打破。在这一点上，南方阵营的传统既得利益无疑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自第一轮议会选举结束后，尤其是2005年3月13日第二轮议会选举结果一公布，作为反对派的南方阵营就以反对“选举舞弊”为由组织大批示威者上街游行。这一游行示威活动从南部奥什州的阿拉万开始并于3月23日蔓延到吉首都比什凯克。和平游行与示威活动在后期转变为打砸抢活动。反对派于3月20日占领了贾拉拉巴德和奥什州政府大楼，并于21日占领有“总统行宫”之称的奥什市国际机场。3月24日，反对派占领了比什凯克总统办公室、政府大楼、国家电视台等要害部门。因为在选举中面临重大损失，南方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在先占领了南部各州的情况下，其夺权对象又转移到北方的塔拉斯州、首都比什凯克等地。在南方阵营举行系列抗议活动的情况下，吉尔吉斯已有出现内战的危险。

对北方阵营而言，此次议会选举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实力大增远超预期。北方阵营不但守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还收获了大量新得利益，而这一部分新得利益基本来自南方阵营的利益损失。为了保住新得利益，北方阵营趋于妥协，不愿与失利的南方发生大规模直接冲突，因此，阿卡耶夫及其北方阵营在面对南方阵营的挑衅时选择退让。尽管阿卡耶夫于3月22日发表讲话，决定不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但此前的3月20日，

^① Steve Hess, "Protests, Parties, and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Competing Theories of Color Revolutions in Armenia and Kyrgyzsta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 No. 1, 2010, p. 33.

吉政府总理曾到南方尝试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因为南方阵营占领了奥什与贾拉拉巴德,双方的谈判无果而终。从3月13日开始的游行示威到20日反对派武力占领南部重镇贾拉拉巴德、奥什两州政府大楼,再到24日反对派占领首都比什凯克总统官邸,^①面对南方咄咄逼人的示威活动,北方阵营没有全力抵抗,甚至是在全面退让。即使到比什凯克已快要落入南方阵营之手之际,阿卡耶夫政府依然没有命令安全力量向抗议者开枪,这与塔吉克内战前夕总统纳比耶夫向政府支持者分发2000支步枪的做法有天壤之别。而总统阿卡耶夫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退让,就是在总统府被抗议者占领后于3月24日乘飞机逃往哈萨克斯坦。

2. 2010年吉“4·7”事件中南北双方的内战意愿

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后形成的南北权力平衡模式的打破,再一次引发吉尔吉斯的政治骚乱。巴基耶夫就任总统后,为了平衡南北阵营势力,先后启用库洛夫等北方人士担任总理一职,且在2007年前多次修宪下放总统权力。南北方实力的相对平衡,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然而,巴基耶夫并未实现当初许下的推进吉政治民主和反腐的诺言,相反,他不仅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控制力度,而且未能有效改善吉经济形势。这些结构性条件的出现,为吉尔吉斯再次发生动乱提供了条件。当反对派祖国党(Ata-Mekkeh)副主席谢尔尼亚佐夫被政府当局拘捕时,^②这一偶然事件就为吉再次出现政治动乱创造了机会。2010年4月6日,约1000名反对派支持者聚集在塔拉斯州政府大楼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释放谢尔尼亚佐夫。最后,示威活动演化为暴力事件,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冲进政府大楼将该州州长劫为人质。第二天,塔拉斯的抗议活动蔓延到比什凯克,以北方阵营为主的大批反对派示威者聚集在比什凯克政府大楼前示威,要求总统辞职。7日夜间,巴基耶夫飞离首都

① 李静杰、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第133页。

② 祖国党于1999年12月16日注册。该党宣称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代表全民利益,主张妥协和相互接纳。党主席为奥·捷克巴耶夫(O. Tekebaev)。祖国党原属南方阵营,后因捷克巴耶夫与巴基耶夫不和而成为巴氏政府的反对派。

比什凯克，反对派宣布“政权已经在反对党的完全掌控之中”。^① 4月8日，以巴基耶夫政府前外长、北方阵营的领导者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为首的吉尔吉斯临时政府成立，奥通巴耶娃担任临时政府总理。此次吉尔吉斯的骚乱被称为“4·7”事件。

事实上，吉南北方之间的对立早在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就开始出现。激化南北方矛盾的事件就是巴基耶夫解除库洛夫的总理职务。“郁金香革命”后，南方人巴基耶夫任总统、北方人库洛夫任总理的组合，原是为平衡南北方政治势力的一种政治安排，也象征着“郁金香革命”后吉的团结和统一。然而，2006年11月，巴基耶夫解除了库洛夫的总理之职，这使短暂平息的南北权力之争重新浮出水平，南北之间的分立再次被视为对吉统一的主要威胁。库洛夫此后加入吉反对派，并领导了吉2007年4月的政治抗议活动，使吉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争议再次具有了南北权力斗争的色彩。2007年后，吉中央政权开始明显偏向以总统巴基耶夫为首的南方阵营。2009年7月大选后，巴基耶夫虽然任命北方阵营人士为总理，但总理实权大减，议会席位也明显偏向南方阵营，北方阵营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本来总统宝座落入南方人之手已让北方阵营不满，巴基耶夫的集权倾向，更让北方阵营蒙受进一步的损失，政府逮捕反对派人士的做法为北方阵营的冒险提供了机会。不难发现，“4·7”事件中发生抗议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北方的塔拉斯、纳伦、伊萨克湖和托克马克等州市，这意味着北方阵营具有激化冲突的意愿。

至于巴基耶夫和南方阵营的内战意愿，则需做进一步的考察。如果巴基耶夫有进行内战的倾向，那么吉就很有可能发生内战。然而，巴基耶夫政权和南方阵营的内战倾向并不那么明显。与阿卡耶夫不同，巴基耶夫政权安全力量曾向抗议者使用过暴力，而且抗议者占领白宫后巴基耶夫并未直接逃离，而是回到了南方。巴基耶夫的选择，意味着他曾试图以南方为据点与北方进行对峙。然而，南方阵营的分裂彻底破坏了巴基耶夫的重新

① 奥通巴耶娃是南方人，但因为长期在国外担任外交官，南方色彩并不浓厚。

掌权计划。由于巴基耶夫家族势力在南方阵营中的扩张,巴基耶夫政权一度被认为是家族政权,更有传言说巴基耶夫曾计划让次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接任总统。这种安排,导致南部阵营许多人产生不满。加之巴基耶夫政权的腐败和在经济上的无所作为,南方许多民众也对其感到失望,因此“4·7”事件中有部分南方人向北方阵营倒戈,并与之结成联盟。在贾拉拉巴德,他向约5000名民众发表长篇讲话,然而约半数民众并不支持巴基耶夫,主要由年轻人构成的抗议团体举行的抗议甚至中断了巴基耶夫支持者的集会。巴基耶夫的保镖鸣枪示警,巴基耶夫才得以脱身。这说明即使在南部,巴基耶夫也面临一定的反对力量,这无疑降低了巴基耶夫发动内战的意愿。除了支持基础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牢固,一个削弱巴基耶夫内战意愿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巴基耶夫对其最大收益——自身和家属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珍视。在已经丧失权力和家族腐败严重的情况下,一旦临时政府有效控制局面,巴基耶夫马上将面临审判或失去自由的可能。因此,能保障自身和家属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对巴基耶夫而言是一种收益;为获得这种收益而倾向妥协,是巴基耶夫的理性选择。

吉临时政府愿意保障巴基耶夫的人身自由,为彻底打消巴基耶夫的内战意愿提供了条件。在4月12—13日华盛顿核安全会议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他已与巴基耶夫和吉临时政府通过电话,并就此问题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①接着在4月14日,巴基耶夫与俄罗斯总理普京在“4·7”事件后第一次举行电话商谈,俄官方表示这是应巴基耶夫的请求进行的,不过谈话内容至今未公布。^②经过这些沟通,巴基耶夫于4月15日乘坐哈萨克斯坦派出的一架军机离开了吉尔吉斯,前往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可以推知,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协调,吉临时政府与巴基耶夫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因为有了这

① Roger Mcdermo, “Nazarbayev’s Role in Kyrgyz Crisi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7, No. 125, 2010.

② http://www.rferl.org/content/Gunfire_Erupts_Amid_Rival_Political_Rallies/2012762.html.

样的交易，巴基耶夫才会于 15 日离开；在离吉之前，巴基耶夫向临时政府传真了他的辞职信。不过，当 19 日抵达白俄罗斯后，巴基耶夫否认自己已辞职，而俄罗斯则明确表示巴基耶夫传真的辞职信无法通过口头声明予以推翻。^①在整个“4·7”事件中，大国的介入极为有限。如果一定要找出这样一个国家，最为突出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在促使巴基耶夫离开吉尔吉斯斯坦问题上，哈萨克斯坦的调停和斡旋促进了吉事态的更快解决。至于“4·7”事件之所以没有演变为内战，除了巴基耶夫内战意愿不高，其内战能力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吉动乱期间双方进行内战的能力

吉尔吉斯 2005 年和 2010 年的两次动乱，属于内战分析框架中的不同类型，它们导致内战的危险程度也不一样。比较而言，虽然 2010 年的“4·7”事件的持续时间短于 2005 年的“郁金香革命”，不过它带来的危险要高于后者。这主要是因为，“4·7”事件属于有内战意愿而无内战能力的类型，而“郁金香革命”则属于“无内战意愿但有内战能力”的类型。无内战意愿，即使具备内战能力，这种内战能力也不会得到使用，从而消弭了内战的可能性，正如阿卡耶夫的逃离所显示的。在“郁金香革命”中，反对派尽管控制了南部的三个州，并将抗议活动拓展到塔拉斯和比什凯克等地，然而阿卡耶夫仍然掌握着北部的安全力量。反对派在控制了南部各州之后，3 月 22 日南方各州的执法机构宣誓向反对派效忠。因此，“郁金香革命”中的南北双方都拥有可观的安全部队和武器。阿卡耶夫一旦向抗议者大规模使用武力，或者向政府支持者大量发放武器，那么必定会导致局势升级。值得庆幸的是，南方阵营虽然有内战的意愿，但阿卡耶夫并无此意愿。如此一来，就有效地避免了南北双方由权力斗争演变成一场血腥内战的可能。由此可见，内战意愿对于内战能否爆发

^① 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_Rejects_Bakievs_Claim_To_Kyrgyz_Presidency/2021498.html.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双方都具有内战意愿但不具备内战能力的情况下,情况就变得极为危险。只要局势稍加变化,双方获得内战的能力,那么在缺乏外部力量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内战的爆发就变得迫在眉睫。这种情势正是“4·7”事件中在4月8日至14日这段时间内遭遇到的情况,这段时期也是吉政局发展方向最不明确的时期。

这段时间内“4·7”事件之所以未演变为内战,原因在于巴基耶夫缺乏进行内战的能力。如前所述,内战能力主要是指人员与武器。上文提到巴基耶夫已意识到其支持基础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牢固,这意味着即使他进行内战动员,也可能招募不到足够的战斗人员。不过,对巴基耶夫从事内战能力构成更致命制约的是其无法获得充足的武器。吉尔吉斯跟塔吉克一样,独立时并无自己的武装部队,直到1999年和2000年先后两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吉才下决心发展自己的军队。然而,吉宪法规定,吉军队不得参与政治事务,所以军队在吉两次政治动乱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4月7日当天,吉尔吉斯反对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原国防部长伊萨科夫(Ismail Isakov)于4月7日被反对派从监狱中释放,临时政府很快控制了军队。伊萨科夫原本是巴基耶夫的政治盟友,他自“郁金香革命”后到2006年5月28日担任吉国防部长,随后担任吉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但2010年1月他由于被指控滥用职权等而被判处8年监禁。^①伊萨科夫具有相当高的民望,^②尤其在吉军队和安全力量中极富影响力。伊萨科夫被反对派释放出来后,即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国防部长,这对临时政府控制军队和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巴基耶夫任命的国防部长卡尔耶夫(Baktybek Kalyev)随同巴基耶夫逃离比什凯克,最后于4月15日被临时政府在南部抓获。

① Alima Bissenova, “20 January 2010 News Digest,”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257>.

② 据4月28日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伊萨科夫是排在奥通巴耶娃和特科巴耶夫(Omurbek Tekebayev)之后的第三位最受民众欢迎的临时政府首脑。见 Erica Mara,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in Kyrgyzstan,” *The Jamestown Eurasian Daily*, Vol. 7, No. 84, April 30, 2010.

除了无法得到军队的支持，巴基耶夫也无法从其他力量处获得武器。首先是控制吉国内秩序的安全力量内务部早在4月7日就已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内务部长、巴基耶夫的亲信孔甘季耶夫（Moldomusa Kongantiyev）于6日被塔拉斯抗议者劫持为人质。这使巴基耶夫丧失对内务部的控制。反对派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其他政治犯，却有效地控制了警察、媒体、议会、医院与比什凯克国际机场等关键力量或机构。^①“4·7”事件发展太快，巴基耶夫在强大的抗议浪潮前坚持不到两天就出逃，而且出逃时仅有一架专机，巴基耶夫政府的一些高层官员要么投降、要么被逮捕，吉政府各机构很快被反对派控制。正是考虑到临时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军队、内务部等政府机构，奥通巴耶娃4月10日自信地表示“所有的安全力量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巴基耶夫无法为进行内战提供充足的武器。巴基耶夫同样无法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等国获得武器。因为担心吉的动荡局势影响到本国的政治稳定，吉的邻国很早就关闭了与吉的边界。

最后巴基耶夫所能仰仗的就是贾拉拉巴德和奥什等南部地区的支持。这两个地区都出现了支持巴基耶夫的集会，奥什市市长梅尔扎克马托夫和贾拉拉巴德州长马西洛夫明确表态支持巴基耶夫并对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然而，支持巴基耶夫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巴基耶夫打内战。尽管被巴基耶夫一手提拔起来的马西洛夫对巴基耶夫极为忠诚，然而他很快被临时政府解职。至于梅尔扎克马托夫，他与巴基耶夫的关系虽然比较密切，但梅尔扎克马托夫并不像马西洛夫一样对巴基耶夫忠诚。在临时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军队和北方各州的情况下，支持巴基耶夫打内战并无胜算。这影响了梅尔扎克马托夫对巴基耶夫的支持程度。支持这一观点的可能证据在于：相对于贾拉拉巴德在4月8日就成立了保卫巴基耶夫委员会，

① http://www.rferl.org/content/Kyrgyz_Opposition_Claims_Power_Vows_To_Investigate_Bakiev_Rule/2006140.html.

② 《总统拒绝辞职拒绝离境 吉尔吉斯可能爆发南北内战》，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jierjisisaoluan/zuixin/201004/0410_9935_1600108.shtml。

奥什的保卫巴基耶夫委员会直到4月26日才组建,这说明梅尔扎克马托夫对巴基耶夫的支持并不坚决。梅尔扎克马托夫的举动,更多的似乎是与临时政府进行博弈。临时政府虽然尝试解除梅尔扎克马托夫的职务,但由于后者具有较强的政治基础,得到了奥什民众的广泛支持,所以临时政府不得不让他留任奥什市长。

因为巴基耶夫无法从军队、安全力量、外部势力和南部地区得到进行内战所需的武器,加之南部民众并不对他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巴基耶夫进行内战的能力就受到严重制约。巴基耶夫出逃后,吉尔吉斯虽然发生了零星的暴力冲突事件,但没有发展为内战。即使巴基耶夫曾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有过内战的意愿,但内战能力的缺乏,使吉尔吉斯得以再一次避免政治动乱演变为内战。

总之,内战若要爆发,内战意愿和内战能力两者缺一不可。“郁金香革命”中,虽然南北双方都有内战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可能并不对称),但因为阿卡耶夫缺乏进行内战的意愿,这次政治动乱以阿卡耶夫政权的倒台而结束。至于“4·7”事件,即使巴基耶夫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或许产生过内战的意愿,但内战能力的缺乏使他不得不重蹈阿卡耶夫的覆辙,以逃亡换取维护自身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保障。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源自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面临相似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以及诸多相似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两个中亚国家塔吉克与吉尔吉斯,为什么前者发生了内战,而后者虽然经历两次大规模的骚乱却避免了内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存在可能导致内战爆发的结构性条件的国家中,敌对方是否同时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和能力,是冲突演变为内战的必要条件。

在塔吉克内战的发展过程中,双方都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和能力。在意愿方面,政府方(由列宁纳巴德人、库里亚布人、吉萨尔谷地乌兹别克族人组成的塔吉克人民阵线)和反对派(主要由加尔姆和帕米尔组成

的塔吉克联合反对派) 均认为在局势发展中自身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如前景理论的推断, 在这一情况下, 敌对双方都倾向于冒险, 从而具有了从事内战的意愿。在能力方面, 武器的获得尤为重要。尽管塔吉克独立时并无军队, 但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了为数较多的武器。在塔双方政治势力具有进行内战的意愿又获得了内战能力而俄罗斯无力也无意进行干预的情况下, 塔吉克的内战不可避免。

在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和“4·7”事件中, 前者因为缺乏内战意愿、后者因为缺乏内战能力, 最终导致政治动乱未演变为内战。吉两次政治动乱都缺乏强有力的外部干预, 所以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在“郁金香革命”中, 南方阵营因为在议会选举中利益受损, 所以有内战倾向, 但北方阵营因为获益良多, 所以愿意妥协。虽然双方都具有内战的能力, 但阿卡耶夫和北方阵营因为缺乏内战的意愿, 所以“郁金香革命”停留在政治骚乱导致权力转移的阶段。在“4·7”事件中, 北方阵营因为巴基耶夫的集权倾向侵蚀了它们的既得利益, 所以具有内战倾向, 而巴基耶夫阵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4月8—14日)也许具有内战的倾向, 然而因为北方阵营掌握了军队和安全力量, 而南方阵营未能获得足够的内战能力, 尤其是缺乏武器。因此, 巴基耶夫不得不逃离吉尔吉斯, 从而避免了内战爆发。

本文的研究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其一, 本文分析框架的普遍性有待更多的案例或样本进行验证。本文认为内战的爆发, 首先要求内战中的行为体必须同时具备内战的意愿和能力; 至于满足这些条件后内战是否发生, 还需考察导致内战是否会出现的结构性条件。就此而言, 敌对方的内战意愿和内战能力, 构成内战是否发生的必要条件; 而催生敌对方敌意的族群怨恨、经济贪婪、地理位置、国家能力等因素, 则构成内战是否发生的辅助条件。内战的出现, 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二, 本文无意在政治动乱与内战之间建立必然的关系。政治动乱与内战是两类不同的政治现象, 前者并不一定会演变为后者。本文的分析框架也指出, 即使出现政治动乱, 如果冲突双方没有内战的意愿和能力, 那

么即使存在可能导致内战发生的结构性因素, 纷争也只会停留在政治动乱阶段而不会演变为内战。

其三, 参考文献有待丰富。限于中亚研究资料的匮乏, 本文对塔吉克内战与吉尔吉斯政治骚乱的研究仅限于公开发表的英文文献, 很少涉及俄文文献, 更未对塔、吉事件决策者、当事人或普通民众进行深入访谈。研究资料的局限,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塔、吉两国决策过程的描述和理解, 甚至在对事件细节的描述上也存在一定出入。不过, 考虑到中亚是国内外学界较少涉及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只能通过尽可能多地参考相关英文研究文献, 尽量做到论述和观点与中亚国家的发展历程相契合。希望以后有学者可以利用更多的文献对本文提出的观点进行完善或修正, 以丰富对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轨迹和动力的研究。

作者简介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1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2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电子信箱: diaodaming@ gmail. 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0 年和 2012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 gmail. com

王广涛 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201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9 年在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wangguang33@ 163. com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2010 年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zdxyyjs@ yahoo. cn

陈一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 年 7 月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yyor@ 126. com

张 锋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 gmail. com